第一章　辛亥革命在云南

一、《云南》杂志的宣传和鼓动

辛亥革命前的清朝末年，云南的革命青年在日本东京办了一个刊 物，名叫《云南》杂志。这个杂志，结合云南的实际情况，进行 了大量的反帝反封建的宣传，鼓动人们起来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在说明这个杂志前，我们需要交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

19 世纪末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国最早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此后，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和爱国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 1905 年，孙中山联合了几个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建立了同盟会，这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成立后，领导了中国革命进行了多次英勇的斗争。

这时的云南，由于地处英、法两大殖民地缅甸、越南之畔，成为英、法争夺的重要焦点，他们企图把云南变成入侵中国的“ 后门 ”。所以，在辛亥革命前，就有人指出“ 云南之危，危及全国 云南之急，急于各省。”不少有志青年为了挽救祖国，挽救云南，出国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其中去日本的最多。

云南留日的革命青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较大。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李根源、罗佩金曾向孙中山求教救国救民的真理，孙中山勉励他们说“ 革命是艰苦的事，要卖命啊 !”同盟会在

日本东京成立后，云南留日学生杨振鸿、吕志伊、赵伸、李根源等很快就加入了，还建立了同盟会云南支部，吕志伊为同盟会云南支部长兼同盟会总部评议部评议。

同盟会为了加强革命舆论工作，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民报》。同盟会成立以及《民报》创办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在《民报》创刊后不久，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向李根源等说，由于列强的侵略和官吏的压迫，云南人民易于鼓动奋起“故筹办云南地方刊物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李根源等接受任务后，立即进行筹备。在孙中山、黄兴以及留日学生，海外华侨的支持下，于 1906 年 4 月成立了《云南》杂志社，推举李根源、赵伸为干事，负总责；以张镕西为总编辑，席上珍、孙志曾为副总编辑。同年 10 月，《云南》杂志创刊号出版，直到 1911 年辛亥武装起义爆发时停刊，长达 5 年之久，共发行 23 期及特刊《滇粹》 1 期。《云南》杂志是在辛亥革命以前，各省以省名称命名的杂志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种。

《云南》杂志以宣传民主主义，反对英、法等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广泛阐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外历史等许多方面。《云南》杂志在发刊词中就说，杂志不只是讨论学术问题，增加知识“实为同人爱乡血泪之代表”。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紧密勾结，实行残酷的统治，没有丝毫民主可言。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发展过程中，深切地感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束缚，迫切要求经济上的独立、政治上的解放，因此对于改革政治，夺取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特别关心。《云南》杂志在《云南杂志万岁！云南杂志万岁！》一文中就说，要“启人智识，惊醒国魂，激起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推倒专政政体，鼓吹民族主义”“挽狂澜于既倒，扬国旗于将来”。《云南》杂志在这里，已

经把爱国与革命联系了起来，要爱国就必须起来革命，以推倒专制政体，把自己祖国的国旗高高飘扬起来。

《云南》杂志在宣传中，把反对外国的侵略与反对侵略者的走狗联系起来。杂志文章说“欲抵制外人，必先抵制政府。”不然，我民于直接争之，而政府即于间接送之。”因此，《云南》杂志在进行宣传活动的同时，还勇敢地领导了云南人民反对清王朝及云贵总督丁振铎、洋务局总办兴禄等丧权辱国、压榨人民的斗争。丁振铎在云南任职期间，伙同兴禄一伙官吏，出卖云南的权益，镇压人民的反抗。1900 年，丁振铎等镇压昆明人民，包庇法国驻云南领事方苏雅偷运军火，并将侵略分子保护出境；兴禄也一味讨好帝国主义。法国强修滇越铁路，云南人民拒绝替法国出力修路，兴禄却挖空心思替洋人出主意，讨好法国侵略者。云南各界人士一起行动，反对丁振铎、兴禄任职，决心把这伙卖国贼赶出云南。1906 年 7 月，李根源受同乡会的委托，去北京与清政府交涉，要求撤换丁振铎、兴禄。8 月，云南全体学生代表云南人民接连 3 次电告清政府，要求审查丁振铎、兴禄的罪行。9 月，在越南的留学生也电告清政府，要求撤换丁振铎。驱逐丁振铎、兴禄的运动不断高涨。清政府迫于人民的压力，以岑春煊补授云贵总督，调走丁振铎、兴禄。这次驱逐丁振铎、兴禄的斗争取得了胜利，鼓舞了云南人民的斗志。

《云南》杂志在宣传科学与民主思想方面，也作出了努力。《云南》杂志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伦理观念和政治思想进行了批判，指出所谓“君权神圣”“三纲五常”，都不是人类“固有之物”，而是人为地制造出来愚弄人民的东西。国家的主人不是皇帝，而是国民。因此，《云南》杂志大声疾呼要“兴民权”，给国民以“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陪审及充当裁判僚属之权，有为各种官吏之权，于地方行政有参预自由之权。”

《云南》杂志用大量篇幅，联系列强虎视云南的严重局势，号召人民赶快起来挽救危亡，进行斗争。《云南》杂志大声疾呼，揭露英、法侵略者“野心勃勃，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必欲得我云南以为越南屏藩之计，然后窥伺四川，直下长江”，妄图霸占中国。杂志揭露，法国首都出版的地图，竟把云南绘入法国的属地，足见其居心叵测。杂志向云南人民发出警告说，云南已成为英、法争夺的焦点，危在旦夕。针对英、法掠夺云南路矿权的事实，杂志把保卫路矿权的任务放在重要地位，果敢地喊出了“中国之土地，我中国四万万人民之所有”的口号。大声疾呼：“云南者，云南人之云南也。头可断，身可灭，家可毁，而地不可失，种不可奴，国不可亡。”铮铮铁言，表达了云南人民气吞山河、誓死不作亡国奴的气概。这对于启发人民的觉醒，对于当时云南以保卫路权、保卫矿权、自办铁路、自开矿产为重要内容的爱国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云南》杂志虽然以一省之名命名，主要宣传对象是云南读者，然而它的影响却大大超越了省的界限。它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是当时学生界的“杂志之花”。云南以至全国许多革命人士对《云南》杂志花费了很多心血，抱有很大希望。不少留日学生回到云南，在戎马倥偬之中，对《云南》杂志一直念念不忘。《云南》杂志发行员、革命党人刘九畴为办好、发行好《云南》杂志，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吐血病逝。《云南》杂志为适应反帝反封建的需要，发行很广，除昆明兴隆街设有《云南》杂志分社，省内各府、州、厅设有代办所外，在国内其他省区及海外的新加坡、缅甸、越南等地也设有代办所。发行量由几千份增到 1 万多份，这在 20 世纪初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在《民报》、《云南》杂志的宣传鼓动影响下，辛亥革命前夕，云南先后发行多种进步刊物，如《云南公报》、《星期报》、

《云南旬报》、《云南日报》、《滇话报》等,有力地促进了云南人民的觉醒，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舆论的准备。

由于《云南》杂志影响日益扩大，引起了中外反动派的嫉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清朝云南当局竟下令，逮捕《云南》杂志在省内的推销员，禁止学生阅读《云南》杂志。 1908 年夏，《云南》杂志发行第 13 期，与同盟会总部机关报《民报》同时被清政府勾结日本当局查禁，一度停刊；后又借故干预，再度停刊。然而，在各方面革命者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云南》杂志坚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才正式停办。《云南》杂志是云南近代史上一只革命的号角。

二、河口起义与永昌起义

辛亥革命前夕，在云南这块土地上，曾爆发过两次由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这就是河口起义和永昌（今保山）起义。这两次起义最后虽然都失败了，然而它们却教育和唤醒了云南人民，为辛亥云南起义奠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们先说说河口起义。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以后，把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武装起义放在首位。从 1906 年 12 月起，到 1908 年春，同盟会先后 7 次领导反清武装起义，其中云南河口起义是比较重要的一次。稍后的永昌起义，则是由同盟会云南支部领导的。

孙中山很重视云南地区的革命活动，因此同盟会在继广西镇南关起义之后，立即领导和发动了河口起义。河口是我国云南南部毗邻越南边境老街的重镇，云南的门户，滇越铁路的交通孔道。清政府在这里设有督办署，并建有炮台四座，派有重兵把守。因为河口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孙中山在越南河内设立了机关部，计划在云南发动起义，河口既是必争之地，也是可以选作

起义的重要地点。

孙中山在 1907 年 12 月镇南关起义前，即着手筹划河口起义，计划夺取河口后，进一步控制整个云南。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把留在越南北部山区的会党武装 300 多人组织起来，命同盟会员黄明堂率领，装扮成工人，分布在滇越铁路沿线。1908 年 4 月，孙中山委派黄明堂负责河口起义的事情，又派王和顺、关仁甫协助。起义前夕，关仁甫来到河口，在清朝军队中秘密策动，清军管带（营长）黄元贞、守备熊通和河口警察，激于大义，表示愿意参加起义。

1908 年 4 月 30 日凌晨，黄明堂率军向河口发动猛攻，河口起义爆发。铁路警察首先响应，杀死反动营长，加入起义军，攻击督办署。督办王玉藩率清军两营，拼命反抗。这时，黄元贞宣布起义，加入革命军，起义士兵增加到 500 余人。王玉藩见势不妙，使用诈降计，派人到革命军营相约，准备投降。革命军派代表王槐廷率兵 2 人及法国商人 1 名，前往王玉藩所在之半山炮台，以测其诚意。王玉藩背信弃义，忽然开枪打死革命军代表王槐廷及士兵 1 人，法商及另 1 名士兵逃回。革命军甚为愤怒，向半山炮台发起攻击。守备熊通趁机击毙王玉藩，宣布起义。河口副督办王镇邦、管带岑德贵拒不投降，起义军处死了王镇邦，岑德贵逃走。河口为起义军占领。河口之役，缴获步枪千余支，库存子弹 7 万余发，加上投降兵士所带的子弹共约 20 余万发，悉归起义军所有。

黄明堂占领河口后,即以‘ 中华民国军南军都督 ’名义布告安民，发布宣言称：“ 本军政府今起国民军，拟欲推倒现今之清政府，建造社会主义之民主国家，同时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 ”

起义军纪律严明，深得群众拥护，归附起义军的士兵和云南各族群众源源不断，几天之内起义军增加到数千人，声威大震。

起义军得到了河口商人和越南华侨的资助，河口商人资助 1700 多元，越南华侨资助 4000 多元，并运来大米 400 多包。

起义军攻克河口后，计划进攻蒙自，进取昆明。为此，兵分两路，一路由王和顺率领沿铁路前进，一路由关仁甫率领沿红河而上。沿铁路前进的起义军，劝说驻铁路沿线的清军官员李兰亭、黄茂兰投降，李、黄即率部响应，起义军顺利占领了南溪、老范寨、新街等据点。另一路沿红河而上的起义军，也攻克了蛮耗，进逼蒙自。在临安（今建水）的同盟会员李伯东积极组织学校师生，准备响应起义。

孙中山在新加坡闻知河口起义得到云南各族人民的支持，非常高兴；又听说河口起义缺乏得力的指挥将领，乃于 5 月 3 日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赴河口前线督师。黄兴在 5 月 7 日赶到河口前线，指挥战斗，并亲自率领一支部队进攻蒙自。但是，起义军粮饷弹药缺乏，无法继续组织进攻。黄兴不得已于 5 月 9 日返回越南河内，筹集粮饷弹药，购买武器。可是当 5 月 11 日黄兴行至越南老街时，被法国殖民当局以“日本间谍”为名，加以逮捕，不久又被驱逐出境，押往新加坡。在越南境内筹办的粮食和器械，又被法国殖民当局扣留禁运。

云贵总督锡良听到河口警报，十分惊恐，一面急调署蒙自关道增厚、开广镇总兵白金柱率军南下救援；一面急电清廷，请求支援。清政府派刘春霖帮办云南边防事务，令广西提督龙济光接济饷械，要求四川、贵州增援部队。各路清军疯狂地向起义军进行反扑。加上，法国殖民当局封锁边界，阻止起义军及粮械进入云南。这样，由于帝国主义的阻挠，起义军失去主帅，补充粮饷弹药的指望又落了空。于是，起义军被迫撤至河口。处于优势的清军尾随而来，黄明堂被迫率领余部 600 余人退往越南境内。法国殖民当局竟然将这支起义军包围缴械，全部押送到新加坡。5 月 26 日，清军占领河口，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大屠杀。一场轰

轰烈烈的河口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河口起义后半年，在云南又爆发了永昌起义。永昌起义是由云南同盟会员杨振鸿直接领导的。杨振鸿，云南昆明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6 年春回国，沿滇越铁路调查中法军队以及滇越交界各要隘地，以为抗法斗争的准备，又准备谋杀云贵总督丁振铎。其时，云南设立体操专修学校，杨振鸿出任校长，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有很大的鼓动作用，并成立“公学会”，联络各界人士。1906 年底，杨振鸿去腾越（今腾冲）任巡防营管带，秘密召集当地爱国人士，筹商起义方法，拟于 1907 年夏发动起义，先占腾越，进攻永昌、大理，进取云南全省。此事为人告发，云贵总督下令调杨振鸿到昆明，另行安排，并暗中派人阴谋将他杀害于途中。杨振鸿知道事情败露，乃逃往缅甸，再转道去日本，继续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

河口起义爆发后，在日本东京的同盟会云南支部就派杨振鸿等携带捐款回国，支援河口起义。然而，杨振鸿一行到达香港后了解到，河口起义已经失败，清政府正在搜查革命党人。杨振鸿于是决定，一部分人员返回东京，创办“速成军事讲习会”，培训武装起义人员；自己带领少数人秘密进入云南，以图再举。

杨振鸿先到新加坡，向孙中山请示方略。孙中山赠送《革命方略》一书，要他们照书上的原则进行。杨振鸿进入滇西后，一方面联络干崖（今云南盈江县境）土司、同盟会员刀安仁，另一方面又在缅甸仰光办同盟会缅甸支部机关报《光华日报》，还积极运动当地巡防队。《光华日报》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对读者影响很大。报纸出版一个多月，同盟会缅甸支部的成员即由二三十人增加到 400 余人，仰光成了杨振鸿策划永昌起义的中心。同盟会员张成清在缅甸曼德勒创立“绝死会”，与会的侨商近万人。不幸，1908 年 9 月，张成清为英缅当局所杀害。

杨振鸿到滇西秘密策划起义的行动，为清政府所获悉。云贵

总督锡良悬赏 5 万元缉拿他。杨振鸿毫不畏缩，毅然奔走于滇西各地，最后来到永昌蒲缥何家寨，与同盟会员何畏等商议认为，机不可失，决定尽快武装起义，并制定了起义计划：先以敢死队攻永昌城，再以一军攻腾越，然后向大理、昆明发展，最后派师出省，戡定中原。计划于 1908 年 12 月 23 日凌晨起义，杨振鸿派何畏潜入永昌，作起义的最后准备。

但是，起义前夕走漏了风声，清军已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12 月 23 日凌晨 3 时，杨振鸿首先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率领傣、景颇、傈僳、汉等边疆各族群众 1000 多人，渡过怒江，经布里戛、蒲缥，直达马岭寨，准备袭击永昌城。但因清军早有准备，防守甚严，进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杨振鸿、何畏等人相向叹息，不得已下令撤退至满林寨，图谋再举。

杨振鸿等人来到满林寨，喘息未定，清军追兵随之跟到。这次永昌起义是杨振鸿花多年心血策划的，没有成功，心急如焚，加上劳累过度，染上了虐疾，听到清军追兵将至，恼恨交加，呕血不止。何畏等趁天色尚未明，背着他转移到何家寨，让他在何兴家中治病。但是，杨振鸿因起义失败，呕血过多，终于在 1909 年 1 月 2 日去世，时年仅 35 岁。临终时仍念念不忘革命。

杨振鸿虽然去世了，然而他在滇西地区的艰苦活动，传播了民主革命的种子，促进了滇西和云南民主革命的开展。杨振鸿是为云南辛亥革命前起义中牺牲的第一人。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下令追赠杨振鸿为“佐将军”，辛亥云南军都督府将杨振鸿遗体迁葬永昌城外太宝山，云南都督蔡锷亲笔为他题写墓碑“：云南首倡光复杨忠毅公墓”。云南地方政府后来还为杨振鸿铸造铜像，矗立在昆明金碧公园（今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所在地）内，以纪念这位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先烈。

三、云南陆军讲武堂

云南陆军讲武堂校址，在今云南省图书馆所在地。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辛亥革命前，是同盟会云南支部活动的重要阵地，并为云南以至全国民主革命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和政治人才。

清代末年，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清政府为挽救自己垂亡的命运，决定重建新式陆军（新军）。到 1909 年 2 月，云南新建陆军编成一镇（师），被授予第十九镇的番号，兵员超过 1 万人，加上巡防队官兵总计超过 3 万人。

新军的编练迫切需要新式军官。因此，为适应新建陆军的需要，开办陆军学堂，培养人才，势在必行。云南陆军讲武堂初办于 1907 年 9 月，总办由云南陆军小学堂总办胡景伊兼任，次年 2 月开学，结果才办了 7 个月就停办了。一年以后，到 1908 年 9 月 28 日，云贵总督锡良重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开学，这是一所以轮训新军及巡防营在职军官为主，又招考中学以上学校学生以培养下级军官的新式军事学校。

云南陆军讲武堂复办之际，正值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中国留学生毕业回国，云南当权者便任命大批回国留日学生为讲武堂教官。在这批人中，同盟会员占有很大的比例，如李根源开始任讲武堂监督（继任总办）兼步兵科教官，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沈汪度、唐继尧、张开儒、庾恩暘、顾品珍、刘祖武、李鸿祥、李庚伯、罗佩金等都是讲武堂教官。

与清王朝统治者的愿望相反，云南陆军讲武堂为同盟会云南支部提供了重要的活动场所，同盟会员事实上掌握了讲武堂的大权，这与李根源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李根源，云南腾越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8 年底李根源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第二年回国，被委任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监

督。虽然，当时讲武堂的总办为高尔登，但学堂大权却控制在李根源手里。1910 年夏，李根源继任为讲武堂总办（校长）。

云南陆军讲武堂举办规模较大，班次较多，学生也较多。云南讲武堂开设了甲、乙、丙三班。甲班学员第 1 期有 120 人，学生来源于陆军第十九镇的管带（营长）、督队官（副营长）、队官（连长）、排长等。这些人中，除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及军官学堂外，都要轮流入堂训练。乙班学员第 1 期为 100 人，从巡防营的管带、帮带（副营长）、哨官（连长）、哨长（排长）等军官中，调取年龄在 30 岁以下、文理通顺者参加轮训。丙班学员第 1 期为 200 人，招考贡生、廪生、普通中学堂学生，年龄在 16～22 岁者，学成后补充下级军官。以后又从丙班学生中挑选成绩优秀者 100 人，另授学术课目，称为特别班。1910 年 5 月，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毕业生有志从军者 30 人，投入讲武堂，于是讲武堂又设“附班”。云南讲武堂学制甲、乙班为一年，特班为两年半，丙班为三年。学制较长，课程设置也比较完善，讲武堂分为步兵、炮兵、骑兵、工程兵四种兵科。学校纪律、教学都比较严肃认真。

值得注意的是，云南讲武堂几乎从重建之日起，其大权就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例如，在辛亥革命前，我们已知道的担任讲武堂教官和教职员的 47 人中，同盟会员有 17 人，革命派人士 11 人，倾向革命人士 8 人，政治态度不明朗的 11 人，没有发现明显的反动分子。而重要职务，除了高尔登任过短期的总办以外，几乎全为同盟会员所担任。讲武堂的总办、监督、提案三个最重要的职务均由同盟会员担任；各班班主任、各兵科科长、主要教官、执事官等也都是同盟会员和革命人士担任。入堂学习的学员，同盟会员也占有一定比例。讲武堂内还秘密进行了同盟会员的发展工作，朱德就是在讲武堂学习期间加入同盟会的。

在云南讲武堂的课堂上，在野外演习中，革命教官利用暗

示、举例、隐喻等手法，宣传反清革命思想。李根源与学生讲述明初将领沐英驱逐元朝在云南统治势力的事迹，并建“思沐小墅”于讲武堂的西南角。他说：“思沐，志在匡复。”一次，李根源、李烈钧、罗佩金在昆明北郊黑龙潭演习后，率学生谒薛尔望墓。薛尔望在清军入关后，不愿在清朝统治下生活，全家投黑龙潭而死。回到讲武堂后，李根源利用这件事启发学生的反清革命思想。学生们所学的国文文选，也大多选择激发学生革命思想的文章。

1910 年法国修建的滇越铁路通车到达昆明，李根源召集全体学生讲话说：“法国今天把滇越铁路修抵昆明，我们国家不惟修不起铁路，甚至将国家主权拱手送给外国人。我辈军人，有守土卫国之责，大家在校应该努力学习，将来誓必雪此耻辱。”他要大家去火车站看看，讲话慷慨激昂，讲到痛心之处，不禁痛哭流涕。这一天学生们都到车站去，见到法国人耀武扬威，不禁悲愤交集。回校后，国文课以《看滇越铁路通车后的感想》为题作文，使学生们受到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与口头宣传、现实教育相配合，革命的书刊在讲武堂中秘密地广泛流行，如《民报》、《云南》、《天讨》、《汉声》、《南风报》、《警世钟》、《猛回头》等，进步师生争相传阅。

虽然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为反动派所察觉，但却未发现实据，不便作出大规模处理，最后只好将被人告密的同盟会员、步兵科科长兼教官叶成林解职；将李根源调走，另任督练处副参谋官。

辛亥革命前夕，云南陆军讲武堂甲、乙、丙三班毕业，特别班也提前毕业 100 人，分配到新军第十九镇各营担任下级军官或见习军官，成为辛亥革命的基干力量，他们在辛亥云南起义和稍后的反袁护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南陆军讲武堂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云南的革命熔炉。

四、滇西腾越起义

辛亥腾越起义，是辛亥革命期间云南响应武昌起义最早的起义，它比昆明重九起义还要早 3 天，在云南辛亥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腾越今名腾冲，在云南西部边境，隶属保山地区。腾越自古以来，是我国内地经云南通往缅甸和印度的交通要道，是滇、缅边境上的商业重镇。云南人民在中缅贸易中，常经腾越往来于缅甸北部的八莫、密支那、曼德勒等地。腾越又是汉、回、傣、景颇、阿昌、傈僳、怒等各族人民杂居的地区。清政府在这里设置了腾越厅治和迤西（滇西）道署，军事上为“腾越镇总兵”的镇署所在地。因此，腾越既是滇西边境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军事上的边防重镇。同盟会很注意腾越地区，自 1905 年以后，同盟会会员秦力山、黄毓英、杨振鸿等人先后来到这一地区进行革命活动。杨振鸿在这一带进行革命活动时，介绍了在腾越地区有影响的爱国志士张文光加入了同盟会。

张文光，腾越人，从小跟随其父经商，经常往来于腾越和缅甸之间，亲眼看到英帝国主义者在我国边疆地区进行的侵略和掠夺活动，也看到清王朝屈辱卖国的行径，非常愤恨。 1907 年，张文光与刘辅臣等人取得联系，共同商定献身于革命事业。为此，他们在腾越地区组织了领导反清起义的核心小组，以同盟会员、干崖土司刀安仁为组长，张文光为副组长、刘辅臣为联络员，积极开展活动。张文光拿出自己的家产支援革命事业，创立了“自治同志会”的革命组织，其核心成员 50 多人，曾歃血为盟，宣誓效忠革命。

1908 年 12 月，杨振鸿在滇西发动永昌起义失败后死于蒲缥，这样张文光就承担了滇西革命运动的主要责任。张文光、黄

毓英、杜钟奇、马幼伯等人，继续联络会党和清军，发展革命组织。张文光慷慨拿出家产，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广泛结交有志于反清的爱国人士，发展了哥老会首领、新军排长陈云龙为同盟会员，加上从外地回来的同盟会员何畏、彭蓂、张锴安、李治及华侨商人寸尊福等，形成了腾越地区革命的核心力量。张文光、张锴安、李治出面，以“自治同志会”名义，协助清政府推行“新政”，促进“立宪”为名，发展革命势力。他们深入到南甸（梁河）、勐卯（瑞丽）等傣族、景颇族地区，联络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共同进行革命斗争。

然而，活动经费仍然紧张。同盟会员黄毓英最后一次到腾越，曾拿着 50 两银子找张文光，但没有碰上，于是把银子留在张文光的家里，作为革命活动经费。张文光返家后看到银子和留下的信，非常感动，连夜追赶到橄榄寨，找到黄毓英，对黄说：“你为革命到处奔走，花钱更多，我为革命出点钱是应该的，我们的目的只望革命早日成功。”于是，把钱如数交还给了黄毓英。

1911 年 3 月，广州起义的消息传来，张文光等人根据孙中山的印信和革命方略，决定在腾越发动武装起义。但事机不密，起义的消息被清朝腾越当局侦知，清军腾越镇总兵张嘉钰、腾越关道耿葆奎决定逮捕张文光、张锴安、李治等人。张锴安与腾越厅同知温良彝的私人关系较好，得到告急信，张文光等逃往缅甸，遂免于难。但“自治同志会”却被清朝地方当局下令解散。张文光逃亡缅甸后，仍继续指挥滇西的革命活动，通过同盟会员与会党分子和驻军保持着联系。

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张文光认为大好时机已到，星夜从缅甸潜回腾越，召集革命党人在宝峰山上的宝峰寺举行秘密会议，研究起义的步骤和方法。他们决定通知清军中的革命党人陈云龙、李学诗、彭蓂等人，夺取驻腾越的陆军第二十六标（团）第三营的两个连队和巡防军第四、五两个营的兵

权，用军队的武装力量夺取腾越军政机关。 10月 24 日，驻腾越清军中的革命党人，利用野外操练的机会，在叠水河的玉皇殿举行了秘密的誓师会议。会上决定 10 月 27 日发动起义，并通过了起义军的军纪和禁令，宣读了誓词，表示决心举行反清武装起义。

10 月 27 日下午 7 时，腾越起义爆发，张文光亲自率领一支人马，袭击巡营第四营，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同盟会员李学诗作内应，击毙了这个营的管带曹福祥，夺得了指挥权。同时，陈云龙在新军第七十六标三营，彭蓂在巡防队第五营，也分别处决了抗拒革命的反动军官，率队起义。经过一昼夜的战斗，起义军占领了腾越，腾越镇总兵张嘉钰吞金自杀，腾越关道耿葆奎投降，腾越厅同知温良彝逃走。至此，腾越起义宣告成功，腾越街头飘起了九星旗帜。

10 月 28 日，起义军将领及自治局的绅、商代表在腾越自治公所举行会议，决定设立政府，成立滇西军都督府，以张文光为第一都督，刀安仁为第二都督，陈云龙为都指挥，李学诗、钱泰丰、彭蓂为统领，以“九星旗”为军政府旗帜，并决定扩充军队，向大理、昆明进军，扩大起义成果。同时发出布告声明，腾越起义是孙中山革命方略指导的结果。布告宣布了起义军严格的纪律和暂行条律。其中有“军人不守纪律者斩”；“假威借势，强逼民间财物者斩”；“奸淫妇女者斩”；“买卖货物及银钱平色不公者罚”等规定。

滇西军政府宣布实行国民革命，实行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滇西军都督府地方政权的建设是比较完善的，都督府下设有民政司、财政处、厘税局、盐务局、粮赋处、国民军银行、警察局、电信局、济善局、裁判局、军装局、参谋处、外交处等。仰光同盟会和华侨也派出人员到腾越协助和参加滇西军都督府的政权建设。

滇西军政府受到城乡各族人民的拥护，也得到开明士绅的支持，缅甸同盟会及仰光华侨人士多次捐款相助，瓦城（曼德勒）贵兴祥捐款大洋 2 万元，仰光鼎新公司捐款数万，瓦城福盛隆捐款大洋数千元，在缅的同盟会员寸尊福、李瑞伯、刘玉海等纷纷携款回国相助。

根据杨振鸿生前制定的‘ 滇西首义,推动全省 ’的云南革命方针，张文光决定分兵三路，扩大革命成果。以彭蓂率方旭等营出永昌，以李学诗率李干鲁、宋葆奎、李光斗等五营出顺宁（今凤庆），以刘德胜率一营出云龙，陈云龙率军作各军后援，计划会师大理。

彭蓂率领的部队到达永昌，驻永昌的清军管带罗长庚抗拒革命，为彭部消灭，永昌知县毛汝霖自杀。李学诗率领的部队进入顺宁。刘德胜率领的部队经高黎贡山收抚老窝、梗鲁各土司之后，进入云龙。这样，滇西起义军就控制了从腾越到永昌及其附近的龙陵、永康、顺宁、云州、缅宁、云龙和滇缅边区各土司的地方；声威大震。占领永昌后，张文光命令彭蓂为永昌军统领兼管民政，安抚地方，而命陈云龙为都指挥，率兵继续往大理方向前进。

陈云龙率部到达曲洞时，永平县知事蒋树本投降。陈云龙任命蒋树本为总参谋，继续东进。这时，昆明已经爆发了“ 重九起义 ”,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云南军都督府(云南军政府),大理新军响应昆明的行动，宣布反正。这样，在云南省内就出现了两个军政府并存的局面。云南军政府蔡锷、李根源等通电，要求滇西军政府服从省城，撤回军队，不要继续进攻大理。张文光得电后，命陈云龙驻师永平，听候与省军政府的协议，不得冒昧前进。

那时，滇西起义军沿途收容会党和降兵，已经扩充到 23 个营共 3 万余人，但军纪涣散，指挥失灵。蒋树本首先不听命令，

陈云龙率领的部队也各自为政，纷纷继续东进。大理方面派代表周霞、马骥二人到合江会见陈云龙，请求不要继续进兵，派代表赴大理谈判。但蒋树本已攻占大理以南的蒙化（今巍山），军纪很差，还想继续前进。于是，大理军与滇西军在合江、漾濞之间相遇，双方展开了激战，连续 3 日，滇西军吃了败仗，把部队撤退到太平铺。

大理军与滇西军发生冲突的消息传到昆明，云南都督蔡锷于 11 月 30 日任命云南军政府参议院院长兼军政部总长李根源为陆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总司令，全权处理滇西问题，张文光对此表示欢迎。

李根源率领部队前往大理，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致电张文光，希望和平解决滇西问题；另一方面也作了进军永昌、腾越，并使滇西军就范的打算。张文光深明大义，愿以和平协商方式解决滇西问题。张文光部下的彭蓂、李学诗、刘德胜等人，不仅是同盟会员，还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的学生，与李根源有师生之谊，所以滇西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很有希望的。李根源到大理时，张文光派代表前往欢迎，双方进行了有效的协商，议定滇西军裁军，地方官由省任命，惩办少数肇事将领等项条件。张文光顾全大局，通电接受协议。

1912 年 2 月 1 日，李根源到达腾越，委任张文光为腾越镇军门，专管腾越军务，撤销滇西军都督府。随后，蔡锷、李根源又任命张文光为云南协都督，驻大理，统辖腾越、永昌、顺宁的驻军。腾越随即改名为腾冲，滇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五、昆明“重九”起义

昆明是云南的省城，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重九”起义是指 1911 年 10 月 30 日（即农历九月初九日）爆发起义的